

# 元白唱和诗与地域文化传播

张敬雅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 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既充当对方唱和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二人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外任地唱和诗数量亦远超京城为官所作。不容忽视的是,元白与所处环境时刻进行着双向互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元稹、白居易生存于不同地域环境,受新地域文化、水土的滋养和培育,在移动过程中竭力表现所在地的景观。当地风土习俗、山川名物,大大拓展了唱和诗题材内容;反之,元白长达三十载的往来唱和,又为推动地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关键词]** 元稹; 白居易; 唱和诗

**[中图分类号]** I2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5)04-0124-05

## 一 地理空间位移与元白唱和诗之关系

有关诗歌的研究方法,陈寅恪先生早有述及:“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把所有分散的诗集合在一起,对于时代人物之关系,地域之所在,按照一个观点去研究,连贯起来可以有以下的作用:说明一个时代之关系,纠正一件事之发生及经过,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sup>[1]</sup>傅璇琮先生也曾指出:“作家的出现和成熟、作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文人的唱和和交往、文化的传播和接受,自有其生长的社会文化土壤。应将文学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制度、传统思想、社会思潮、社会群体(家族、流派、作家群、社团等)、科举、幕府、音乐、绘画、民俗、交通等文化层面。”<sup>[2]</sup>唱和诗正是在文人创作意识渐趋转变下生出的重要产物,是一种符合中唐时期整体文学发展状况的特殊现象。

唱和诗发展到中唐,已达全盛。除注重礼仪制度的君臣唱和之外,文人固定唱和最受青睐,诸如元白、刘白、韩孟等创作。这倒不是因为此类创作形式灵活松散便于控制,而是诗人有意将更多亲身经历的要素融入唱和诗本身,赋予其厚重感。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叙诗寄乐天书》云:“每公私感愤,道义激扬,朋友切磨,古今成败,日月迁逝,光景惨舒,山川胜势,风云景色,当花对酒,乐罢哀余,通滞屈伸,悲欢合散,至于疾恙躬身,

悼怀惜逝,凡所对遇异于常者,则欲赋诗。”<sup>[3]</sup><sup>352</sup>据统计,今于元、白别集及唱和集整理可见的唱和诗共238首。其中,白居易原唱诗歌63首,和元稹诗72首;元稹原唱诗歌38首,和白居易诗65首。从纵向看,现存诗篇较清晰地显示,元白之间的唱和诗相对集中于四个时段:元和五年至十年,元稹贬官江陵,白居易在长安为官;元和十年至十三年,白居易为江州司马,时元稹为通州司马;长庆三年至宝历二年,白居易分刺杭州、苏州,时元稹为越州刺史;大和二年至大和四年,白居易自洛阳使还返长安,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任河南尹,退居洛下,元稹先后在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任。从横向看,元稹和白居易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结合元白唱和诗进一步梳理,元稹64首诗歌创作地点可考,其中4首作于长安,27首作于江陵,17首作于通州,1首作于虢州,14首作于越州,1首作于武昌;白居易125首诗歌创作地点可考,其中77首作于长安,4首作于长安赴江州途中,15首作于江州,1首作于忠州,18首作于杭州,4首作于苏州,6首作于洛阳。由数据见出,元白唱和诗多在长安、江陵、通州、越州、江州、杭州、苏州等地创作。外任地唱和诗数量远超京城为官所作。

恰若戴伟华先生《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所述:“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模式包括三个地理空间要素:移出场、移入场和移动路径。”<sup>[4]</sup><sup>18</sup>不论是文士积极地移动,如举子入京应考、职官业务调动奔赴新任

等;还是强制性的被动接受移动,如贬谪。毋庸置疑,文士从移出场经移动路径最终至移入场,在移动过程里,难免形成某种心理感受,并有意识地以文字记录下来,向亲友倾诉。特别的是,元稹和白居易借唱和诗互通有无,“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sup>[5]2795</sup>,使唱和这种表达形式被赋予了新内涵,不再为一般意义上的吟咏活动。而元白唱和诗中所蕴含的地域文化信息及其唱和活动对推动地域文化传播起到的作用,愈发值得关注。

## 二 地域文化环境对元白唱和诗的影响

“文化的生成、发展和衰落,有一定的空间依托,或者说有一定的地理位置,而这种空间正是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切入点,规定了人和自然、社会之间活动关系的性质和品性,它包含了人和土地、水、气候、生物、矿物等自然条件以及人口、经济、交通、风俗、宗教等社会条件的关系。”<sup>[4]15</sup>

唐朝官员从一地迁移至另一地的例子比比皆是。在或长或短的位移中,两地巨大的环境变异,文士身份、权位的瞬间落差,使他们原先那看似稳固的心理状态引发波动,唤起喜欢、憎恶、高兴、难过、赞叹、不满等系列体验,从而投射于诗作。沈佺期《入鬼门关》写道:“昔传瘴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无人老,流移几客还?……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问我投何地,西南尽百蛮。”<sup>[6]</sup>诗歌描绘了一路的艰辛,孤独无依的恐惧,远离京城难以再被重用的失落,体弱病衰的愁怨,无法料知未来的惶惑。张说于长安三年流放钦州,初至岭表便感叹:“狱中生白发,岭外罢红颜。古来相送处,凡得几人还。万里投荒裔,来时不见亲。一朝成白首,看取报家人。”<sup>[7]</sup>诗人胸积沉郁,情绪低沉,不能生还的绝望念头袭向心底。及至中唐,元稹、白居易因遭贬引起的心理变化无不与唐前期诗人们承受的近似,且在唱和诗中一一显露。白居易《雨夜忆元稹》言:“天阴一日便堪愁,何况连宵雨不休。一种雨中君最苦,偏梁阁道向通州。”<sup>[5]913</sup>元稹此行路途险恶难测,加之所允时间紧迫,遂令人担心。随即,元稹在《酬乐天雨后天见忆》写下:“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sup>[3]231</sup>将通州比作“黄泉”,足以见对远贬的惊慌与忧虑。元稹《叙诗寄乐天书》又言:“通之地,湿垫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过半。邑无吏,市无货,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计粒而食。大有虎、貔、蛇、虺之患,小有螻蛄、浮尘、蜘蛛、蛴蜂之类,皆能钻啮肌肤,使人疮痍。夏

多阴霾,秋为痢症,地无医巫,药石万里,病者有百死一生之虑。”<sup>[3]353</sup>此情此景,自不能与在朝为官的安逸舒适相提并论。诗人人生发生极大逆转,躯体和 精神受自然、社会环境等各方侵袭、刺激。随时间推移,情况会变得不同,如李伟先生《贬谪流放文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所言:“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文人士大夫,在遭遇屈辱的贬谪流放的时候,内心是痛苦悲凉的,但文人特有的精神气质和骨气使他们很快从个人的遭遇中解脱出来,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所处的社会生活之中,把中原文明的阳光洒播到当时尚未开化的蒙昧之地,改造和完善了地域文化,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sup>[8]</sup>这一点在与元、白同时代的刘禹锡、柳宗元、韩愈等人经历中也充分验证。

当然,诗人境遇并不总如此困苦。唱和内容的摄入,因时因地调整。元稹、白居易仕途后期分刺越州、苏杭以及东都闲居,或因州郡较通州、江州品级上等,或因年龄增长心态渐趋平和,使诗人即便未能身在朝中受重用,也反增出几分乐于赏玩的闲情逸致。长庆元年,白居易要求外任,同年七月诏除杭州刺史。杭州是江南大郡,治所钱塘县交通便捷,物产丰饶,湖山清峻。此次赴杭,虽与元和十年贬江州取道相同,但心态完全不同。白居易《早春西湖闲游怅然兴怀忆与微之同赏……偶成十八韵寄微之》:“上马复呼宾,湖边景气新。管弦三数事,骑从十余人。立换登山屐,行携漉酒巾。……画舫牵徐转,银船酌慢巡。”<sup>[5]342</sup>《答微之见寄(时在郡楼对雪)》:“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羨若耶溪。……更对雪楼君爱否,红栏碧甃点银泥。”<sup>[5]343</sup>从诗人笔尖流露出的欢喜气息可体会他那份舒缓心情,以及对旖旎风光的由衷赞美和热爱。长庆三年,元稹奉诏为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寄乐天》言:“莫嗟虚老海隅西,天下风光数会稽。灵汜桥前百里镜,石帆山崦五云溪。……安得故人生羽翼,飞来相伴醉如泥。”<sup>[3]248</sup>王十朋《会稽三赋·会稽风俗赋》云:“唐元微之,一代奇才,罢侍玉皇,谪居蓬莱,宾寮邻白,唱酬往来。繇是鉴湖秦望之奇益闻,故其俗至今好吟咏,而多风骚之才。”<sup>[9]</sup>元稹又有《春分投简阳明洞天作》:“旌旗遮屿浦,士女满闾闾。似木吴儿劲,如花越女姝。”<sup>[3]313</sup>白居易以《和微之春日投简阳明洞天五十韵》为答:“瑰奇填市井,佳丽溢闾闾。勾践遗风霸,西施旧俗姝。”<sup>[5]1822</sup>江南儿女柔中带刚、豪迈勇毅的性情,江南水玉并重的文化特点,顷刻跃然纸上。

从元白唱和诗内容看,地域文化激发着诗人的

写作灵感,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作品素材。意象选取、内心体悟再到情感摄入,每个步骤都离不开当地一景一物的真实存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也凸显着元白唱和诗从沉郁到悠闲风格的不停转型。

### 三 元白唱和诗推动地域文化传播

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传播思想。《左传》曰:“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sup>[10]</sup>司马迁《史记》云:“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sup>[11]</sup>特为注重传播的久远。传播学中使用的“传播”一词,则是英语 communication 的对译词。其含义不下十几种,包括“通信”、“会话”、“交流”、“交往”、“交通”、“参与”等等<sup>[12]</sup>。但在相关词典或平日常用语中对“传播”的阐释不外乎是一些表面现象零星列举,未揭示其本质属性。直到学者们经长期不懈努力,才对其概念作出基本定义。所谓“传播”,即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作<sup>[12]5</sup>。“人类传播,是一种将信息进行交换、扩展的行为方式。”<sup>[12]42</sup>施拉姆对此表述:“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如何相互建立联系的。”<sup>[13]4</sup>诗歌传播和其它类型的传播同样涉及两个向度——空间上横向传播和时间上纵向传播。同时,传播者、受传者、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都囊括于传播的整体系统中。谈及传播者,具体指引发传播行为的个体或群体。受传者则是信息接收者,接收信息之后,很大程度对信息加工乃至反馈,以影响传播者。受传者也为个体或群体。新奇处在于,传播者和受传者间关系极其微妙,随时可能发生逆向调整。

诗歌的存在与展开形态因传播这一动力而得到推进。那么,传播者究竟想把怎样的信息广泛覆盖?又以何种方式去实现?要弄清这些问题,充溢行间的诗歌内容便成为关注焦点。元稹和白居易因仕历所经地域广阔,带有浓厚文化色彩的山川景象、名胜古迹触动诗人内心,融汇于文字,向大众展示了人文效应。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此后江陵时作)》:“戏谓青云驿,讥题皓发祠。贫过谷隐寺,留读岷山碑。草没章台趾,堤横楚泽湄。”<sup>[3]118</sup>《思归乐》:“遐想玉泉寺,久闻岷山亭。”<sup>[3]1</sup>《酬乐天闻李尚书拜相以诗见贺》:“百口共经三峡水,一时重上两漫天。”<sup>[3]237</sup>《酬乐天书后三韵》:“今日庐峰霞

绕寺,昔时鸾殿凤回书。”<sup>[3]228</sup>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水过清源寺,山经绮季祠。心摇汉皋珮,泪堕岷亭碑。”<sup>[5]705</sup>《和思归乐》:“汉水照天碧,楚山插云青。江陵橘似珠,宜城酒如觞。谁谓遣滴去,未妨游赏行。”<sup>[5]110</sup>元、白于地理位移中所见如青云驿、四皓庙、谷隐寺、岷山碑、章台、玉泉寺、三峡、两漫天、庐峰、清源寺、绮季祠等景致,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烙印。以元稹贬赴江陵为例,荆楚这片地域河流曲折,湖泊众多,地形多变。恰如王夫之《楚辞通释》载:“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釜嵌戍削之幽苑,故推宕无涯,而天采蠢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sup>[14]</sup>简言之,以上诗歌均体现元、白在唱和往复中获知大量地域信息的源起。而唱和间的地域文化信息广泛且迅速传播功能之实现,得力于诗歌传播媒介的多样。“传播媒介是信息由传播者到达受传者时进行信息交流的社会化活动所必须凭借的手段和工具,是传播得以实现的通道。”<sup>[15]</sup>元白唱和亦道出其诗歌在当时的几种传播途径:

元稹《阆州开元寺壁题乐天诗》云:“题在阆州东寺壁,几时知是见君时。”<sup>[3]226</sup>《见乐天诗》曰:“忽向破檐残漏处,见君诗在柱心题。”<sup>[3]224</sup>白居易《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骆口驿旧题诗》曰:“拙诗在壁无人爱,乌污苔侵文字残。唯有多情元侍御,绣衣不惜拂尘看。”<sup>[5]831</sup>元、白初到某地,立刻在邮亭驿站、寺院等的墙壁上寻觅彼此诗歌,这是基于题壁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在唐代非常盛行。白居易《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又曰:“暗被歌姬乞,潜闻思妇传。斜行题粉壁,短卷写红笺。”<sup>[5]1058</sup>元稹《酬乐天江楼夜吟稹诗,因成三十韵(次用本韵)》云:“伎乐当筵唱,儿童满巷传。改张思妇锦,腾跃贾人笺。”<sup>[3]143</sup>阮阅《诗话总龟》评述道:“商玲珑,余杭之歌者。白公守郡日与歌曰……时元微之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乐天即时遣去,到越州,住月余,使尽歌所唱之曲,即赏之。”<sup>[16]</sup>元、白与名歌妓杨琼、阿软、商玲珑等交谊颇深,二人诗歌常被传唱。正似周月亮先生言:“唐诗的传播,尤其是绝句,借助于音乐、歌唱的力量,传入宫廷、传到酒楼、传到西城边陲……而且是本身就要求唱,而不是念的。曲子词、诗、词都是音乐的孪生兄弟。”<sup>[17]</sup>因歌妓多出入社会各阶层,自然而然,其作为传播媒介增强了文人与大众间的沟通交流。白居易还在多首酬和元稹诗中提及“君写我诗盈寺壁,我题君句满屏风。”<sup>[5]1092</sup>“言是商州使,送君书一封。”<sup>[5]489</sup>“坐到天明吟未足,重封转寄与微之。”<sup>[5]1530</sup>“拣得琅琊截作筒……鱼目骊珠

同一封。”<sup>[5]1552</sup>可见,题壁、题于屏风、歌妓传唱、使者遣送、诗筒传书、友人转寄等都成为元白唱和诗广为传播的方式。

统而观之,加拿大批评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就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命题:“一切传播媒介都在彻底地改造我们,它们对私人生活、政治、经济、美学、心理、道德、伦理和社会各方面影响是如此普遍深入,以至我们的一切都与之接触,受其影响,为其改变。”<sup>[18]</sup>诚然,元、白唱和中,彼此既充当了对方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他们以诗歌为形式,自觉不自觉地推动着地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而多元化媒介的生成,于增进元白唱和诗中的地域文化传播添加了无限动力。

#### 四 元白唱和下的地域文化传播效果

所谓效果,指的是人的行为产生的有效结果。这里的“有效结果”一词,狭义上指的是行为者的某种行为实现其意图或目标的程度;广义上则指这一行为所引起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周围社会实际发生作用的一切影响和后果<sup>[12]188</sup>。

首先,从大的社会背景来看。整个社会纷繁深广,相对而言,人的认知层面却很有限。元稹、白居易于唱和诗中,将自己所见所闻加以编码传递给对方,使对方哪怕不身临其境,也能很清晰、深刻地感受到笔端提及的情状。双方在诗歌所绘场景的引导下思考、假设、还原,这些举动无疑拓宽着诗人们的生存与想象空间。其次,须注意的是,文化有强势和弱势区域之分。文化的强势区通常指政治中心以及由此延展开来的邻近地段,而弱势区则习惯性地被认为是地理位置偏僻,环境恶劣的岭南、巴蜀等区域。元稹、白居易作为朝官迁贬,其身上映现出的先进文化势必与贬地的落后文化有冲突、有撞击、也有融合。他们一方面尽力适应当地生活,同时也极力改善(如提升教育水平),将先进文化传播给民众等。另一方面,当地文化、水土默默地予以滋养,让他们乐意去表现与以往经历中不相同甚至不协调的部分。终究,抛开以山川河流为界对地域先进与落后概念的评定,诗人们在不同环境间的多次生存转移,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文化互动。此般说明:“从文化的世界图景来看,文化具有统一性、整体性和共享性,具有一种整合的客观要求和基础。而人类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是促使文化整合、生成新的文化结构和文化模式的关键性因素。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文化不断整合的历史。”<sup>[19]</sup>再次,元白唱和诗带来的突出效果还表现在形成了辐射四方的地域名片,

传播于世。如二人后期借杭越山水入题的唱和诗,对地域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无助益。西湖富饶美丽的泉石佳处,经反复题咏,其思想、精神融入诗中,继而转变为地域文化的一种代言、符号,遂为人关注,至今仍是著名旅游胜地,极大地发挥着价值。

再从受众角度略观元白唱和诗所达效果。元、白于强势的唐代诗歌传播中敏锐捕捉到传播者和受传者间的微妙关系,成功地心理预设——作品写给谁看,谁愿意看。除唱和双方外,唐代读者,也即现实受众;后世读者,也即潜在受众,都是唱和间信息传播的受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概括了元、白诗歌的传播情况:“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诗,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之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白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sup>[3]555</sup>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言:“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sup>[5]2793</sup>且唐中后期,人们除了采用手抄形式使图书流播外,已开始刊印作品。白居易诗因受大众喜爱,商家觉之有利可图,刊印数次,使诗歌传播日渐规模化。正如法国学者阿斯卡皮所称:“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sup>[20]</sup>全面搭建起文学传播体系。而从“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凡乡校……往往有题仆诗者”的叙述中又可看到,学校是唐代诗歌传播的另一场所,元白唱和诗覆盖范围已延伸至教育等领域。从“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的叙述亦可知晓,唐代交通发达,密集的人口流动将交通网变成诗歌传播网。此外,孙旭培《华夏传播论》一书还强调:“信息实质上不是依自身价值的大小显示其差异,而是因传者的社会等级显示其价值的大小,影响其传播的力度。社会等级愈高则信息价值愈大。”<sup>[21]</sup>的确,元白唱和诗虽集中于相继遭贬外放期间,但受众依旧多且广泛。国内国外,男女老少,他们通过口耳相传、私学教育,模勒印刷,掀起传播和接受风潮。这皆源于元、白二人在朝为官时的文

学创作早已颇具声名。而前文所述的多样传播媒介,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传播者、受传者、传播媒介、传播环境都是实现文化增值不可缺少的环节。自然及社会环境为唱和间地域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地域文化传播过程中,受传者从自身出发,依据个人观念和兴趣取向,满足心理需求,衍生新的文化意义,肩负起使地域文化代代传承的光荣任务。

#### [参考文献]

- [1] 陈美延. 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M]. 北京:三联书店,2001:48.
- [2] 傅璇琮. 唐代文学研究:社会—文化—文学[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45.
- [3] 元稹. 元稹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4] 戴伟华. 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6] 连波,查洪德. 沈佺期诗集校注[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52.
- [7] 张说.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张说之文集[M]. 上海:上海书店,1989:47.
- [8] 李伟. 贬谪流放文人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贡献[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82-85,93.
- [9] 尹占华. 元稹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08.
- [10]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1:1088.
- [11]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35.
- [12] 郭庆光. 传播学教程[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 [13] [美]施拉姆. 传播学教程[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4.
- [14] 王夫之. 楚辞通释[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4.
- [15] 王金寿.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概论[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9:37.
- [16] 陈友琴. 白居易诗评述汇编[M]. 北京:中华书局,2004:68.
- [17] 周月亮. 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史[M]. 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77.
- [18] [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3.
- [19] 庄晓东. 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0.
- [20] [法]罗·埃斯卡皮. 文学社会学[M]. 王光美,于沛,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1.
- [21] 孙旭培. 华夏传播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37.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rial Versifying and Regional Culture Communication

ZHANG Jing-ya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Yuan zhen and Bai Juyi developed good friendship, so serial versifying lasted between them many years. Both of them played the role either as information communicator or beneficiary. Due to profession change, they moved frequently in large areas, therefore, the amount of serial versifying written in other regions is much more than that of the capital. It cannot be ignored that Yuan zhen and Bai Juyi interacted constantly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y live in. With frequent geographical displacement, they are affected and cultured by local culture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reflected in their creation. The content and subject of serial versifying is thus fulfilled by local customs and natural scenery. In the meanwhile, over 30 years of serial versifying developed between them provided opportunities and ways for local culture to radiate and spread.

**Key words:** Yuan zhen; Bai juyi; the serial versifying